

龙榆生选名人尺牋三种

古今名人書牘選



龙榆生选名人尺牘三种

龙榆生 选注

古今名人書牘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名人书牍选 / 龙榆生选注; 毛文鳌整理. —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5

(龙榆生选名人尺牍三种)

ISBN 978-7-5325-8046-0

I. ①古… II. ①龙… ②毛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
IV. ①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8318 号

古今名人书牍选

(龙榆生选名人尺牍三种)

龙榆生 选注 毛文鳌 整理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7.75 插页 5 字数 99,000

印数 1—3,100

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046-0/I · 3041

定价 36.00 元

龙榆生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词学家，他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和商务印书馆合作，先后选编并注释了《曾国藩家书选》《古今名人书牋选》和《苏黄尺牋选》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《古今名人书牋选》，由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十一月发行，分上下册，属于“中学国文补充读本第一集”，由王云五等三人主编，署“龙沐勋选注”。前有龙榆生导言，介绍了此书编选缘起。这次重刊，由毛文鳌先生整理，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，除明显的讹脱衍误外，一般不作更动，以存原貌。

导言

写信是社交上一件最重要的事，那是人人都晓得的，可不须编者再来“饶舌”了。

现在所说的书信，古代只叫做“书”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说：“晋侯不见郑伯，以为贰于楚也。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，以告赵宣子。”又说：楚子重、子反，以夏姬故，怨巫臣而杀其族，巫臣自晋遗二子书。又说：“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币重，郑人病之……子产寓书于子西，以告宣子。”这三个“书”字，都是后来书信的名称所托始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面，也有“滕成公之丧，使子服敬叔吊进书”的一段话。梁刘勰在他著的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篇内说得好：“书者，舒也，舒布其言，陈之简牍。”这可见书信的效用，就是要把个人所想说的话，尽量写在文字上面，叫对方澈底了解他的意思罢了。

写字用的纸，相传是汉代蔡伦才发明制造的。在这以前，普通都用木片和竹片。一块木片或竹片，写不了多

少字,就把绳子穿起来,联做一串,这就叫做“札”和“笈”。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新疆方面搜集得来的这类东西,还不在少数。近人罗振玉编了一本书,叫做《流沙坠简》,收的都是些汉、晋间人写的短信和记载各种物事的数目,也是在新疆方面发现的,可惜原物都被外国人拿走。这书是向外国摄来的影片,比不上中央研究院所藏的,可以叫我们看到我们祖宗写信用的东西的原形。

我们明白了上面的话,再来谈谈书信的各种名称。有的叫做“书牍”,有的叫做“书简”,有的叫做“书札”,有的叫做“尺牍”,有的叫做“笈启”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牍,书版也。”又说:“札,牒也。”又说:“笈,表识书也。”《汉书》师古注:“牍,木简也。”刘熙《释名》:“札,栝也,编之如栝齿相比也。”《尔雅·释器》疏:“简,竹简也。古未有纸,载文于简,谓之简札。”这可见“书牍”等等名称,都不过就所用的工具来说罢了。“启”的应用,原和章奏相同。刘勰说:“启者,开也。……自晋来盛启,用兼表奏,陈政言事。既奏之异条,让爵谢恩,亦表之别干。”(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)又据《晋书·山涛传》:涛为吏部尚书,凡用人行政,皆先密启,然后公奏,举无失才,时称“山公启事”。可见“启”

是臣下对君上用的。到了后来，也就一般通用了。“尺牍”的称谓始于《史记·仓公传赞》有“缙紫通尺牍”的话，后来都把它当作小简的称呼了。

人事日繁，书牍的需要也就日甚一日。我国最古的书牍，要数到周、秦之间。刘勰说：“三代政暇，文翰颇疏。春秋聘繁，书介弥盛：绕朝赠士会以策，子家与赵宣以书，巫臣之遗子反，子产之谏范宣，详观四书，辞若对面。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，固知行人挈辞，多被翰墨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）这可见春秋时代书牍的应用，已极频繁。那时各国争霸，常修聘问之礼，所谓“行人之官”，便要长于“辞令”的人去充任。“辞令”是要微婉而合于“诗教”的，无论腾于口舌，或者写在简牍上面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诵诗三百……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当时国际间的往还，都极重视此事。这种体裁，既然出于春秋行人的“辞令”，所以对于交际方面是最要紧不过的。他的诀窍，既贵明决，又要婉转，好比纯绵裹针，软中自有力量。我们读过《左传》上面的吕相《绝秦书》，就可晓得那种软硬兼施，辞锋何等利害了。

战国策士纵横，献书画策，大开风气。虽然不免夸张的恶习，有时候还要颠倒是非，可是那种锐利的辞锋，剖析利害，曲尽情理，倒很值得研究。从这以后，应用的工具渐渐改良了，笔和绢素，以至于后来通用的纸，都在秦汉而后逐渐通行。书牘的流传，也就跟着日盛日多了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文人学士，就有专门注意这种工作，并且以此擅名的。建安才子，如陈琳、阮瑀、应璩这一班人，都因善为书记，被当代要人所看重。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说：祢衡为黄祖作书记，轻重疏密，各得体宜。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又说：“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。”这些说话，正可看出当时重视书牘的一斑。

魏晋之间，俗尚玄谈，一班阀阅子弟更注意于应对的漂亮，所谓“王谢家风”，影响于社会风尚，非凡之大。加上当时的士大夫都很讲究书法，由篆、隶变做行、草，极其简便美观。钟繇、王羲之都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。因为书法的精妙和吐属的隽雅，应用在书牘上面，何等悦目！这一时期的书牘，可说完全美术化了！只是短短的几行居多数，较少长篇大幅的作品。我们打算把这一类的小简，另外编成小册子，这里就不用多说了。这个时期较长篇、较重要的作品，大半收在《昭明文选》里面，

读者不妨取来一读。

六朝人的书牋，就美的立场来讲，可说是好极了！只因骈偶过多，不免有“文浮于质”的毛病，对于人生方面，没有多大的补益。这种风气，是从建安文人开始，一直到了隋唐之际，还很流行。唐代韩愈、柳宗元一班人拿“古文”相号召，所有书牋也跟着化骈偶为单行，以比六朝，完全变了模样。从这以后，书牋就分“骈”、“散”两体。大抵陈说事理的多用散文，敷衍应酬，或是褒扬赞美，如庆贺答谢一类，需要冠冕堂皇的则以骈体为宜。我们打开宋人的集子来看，不管他是什么古文家，如王安石、苏轼之流，都有“四六”笺启。这可见书牋的体裁，要看应用如何，才能把它决定。

宋人尺牋，最为从来所称道的，要算苏轼和黄庭坚两家。——编者另有《苏黄尺牋选》，也由本馆印行。——这是属于小简一类的，后来影响于明人最大。明人也是讲究书法的，所以对于尺牋方面尽多清隽的作品。世行《明贤书牋》和《赖古堂名贤尺牋新钞》之类，也都有一读的价值。就普通应用方面来讲，尺牋小简占了相当地位。我们如果能够把魏晋以来下迄宋、明诸家的小简汇集起来，做写信的模范，再抽点功夫学学他们的书法，那就不

愁书信写的漂亮了！

现在要谈到选辑这本小册子的宗旨和目的来了。这里面所包涵的作品，是详于近代而略于古代的，是注重内容的充实，而不很注重形式的美丽的。是希望读者了解些做人、办事、立身、处世的道理，和研究学术的态度及门径的。是希望读者把这里面所有的人物当做自己的师友，把他们所说的话拿来身体力行的。是希望读者无论要想做个学术家或者政治家，都要拿扶衰拯溺的精神来做出发点，以求有益于社会民生的。所以对于内容不很充实，以及颓废放诞、不切人生的作品，虽然十分漂亮，也只好暂从“割爱”了。

真实的学问，要从经验中得来。把许多经验丰富的人所说的话，来做我们青年人的圭臬，给我们以立身处世的道理，我想这并不能说是什么迂阔之见吧！

本书所收的作者，除了曹丕、曹植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元稹、白居易纯粹是个文人或诗人外，——曹丕虽然做了皇帝，可是除了文学的成就外，对于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表现。——其余的如马援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王守仁、张居正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曾纪泽等，都是些抱负非

凡,而且在事功方面都有过实际表现的。朱熹、陆九渊、顾炎武,是学术史上最权威的学者。这般人所说的话,都是从学识经验上得来,而且多是把一个“诚”字做出发点的。我们因为先要了解书牍的体裁,有骈文和古文两大派,所以把曹丕、曹植、卢谌、刘琨的作品来代表前一派,韩愈、柳宗元的作品来代表后一派。元、白二人,虽然除了诗的成就外,也并不见得有什么表现,可是他们对于诗的见解,是和其他诗人专门“嘲风雪弄花草”,或者堆砌故实,一味干“雕虫小技”的把戏的,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。他们对于文学的主张,也是要间接有补于社会民生的。所以特地把他两个论诗的信收在这里。我们看了这两封信,可见他们从事诗歌的动机完全是出于“悲悯”的热诚,而以唤醒群众起来改革社会现状为主旨的。居易说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这种从事文学的态度,是值得我们景仰而效法的!此外,论诗的作品,有朱熹的《答陈体仁》、陆九渊的《与程帅》,论文的作品,有柳宗元的《答韦中立论师道》、曾国藩的《复陈右铭太守》、《复吴南屏》,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书牍,也就很够表现一般学者和古文家对于诗和散文的见解了。

宋代的政治家司马光和王安石，完全站在反对的地位。司马光是比较守旧的，王安石是极力主张变法的，虽然政见不同，可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站在“福国利民”四个字上面，所以两人往复辩论，态度是光明磊落的。安石新法的是非功罪，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管他。可是制度虽好，如果运用不得法，或者推动这部机器的不得其人，那么他的结果恰恰会和先前的希望相反。我们且把司马光给安石的一封长信细读一遍，就可以看出新法失败的原因了。他说：

介甫固大贤，其失在于用心太过、自信太厚而已。

——《与王介甫书》

又说：

彼谄谀之人，欲依附介甫，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。一旦罢局，譬如鱼之失水。此所以挽引介甫，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。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欲，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？孔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彼忠信之士，于介甫当路之时，或齟齬可憎，及失势之后，

必徐得其力。谄谀之士，于介甫当路之时，诚有顺适之快，一旦失势，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。

——《与王介甫书》

这是何等透澈诚恳的说话。一个人平日有抱负，有学识，有主张，而且抱着大公无私的态度，要干就干，一切浮言非议本无所用其顾虑。可是过于“刚愎自用”，有时就难免为左右一班小鬼所包围，弄得福国转以病民，良法变为弊政。古今多少大事，都坏在这班谄谀逢迎的小鬼手里！“君子爱人以德”，我们读了这一段话，应该怎样佩服司马光这种对朋友的诚恳态度，和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应付是何等的不容易啊！

朱熹和陆九渊，在宋代的思想界也是站在相反的地位。在他们的集子里，往复辩难的书信尤其不少。他们所争的是真理而不是意气，是学术是非之公，而不是权利地位之私，这精神也是极可敬佩的。可惜多数是涉及哲学范围的话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判断是非的。所以编者只把他们教人怎样做人、怎样治学、怎样办事的短篇书信选了一些放在这小册子里。他那严正的态度和笃实浅近的道理，已经够做我们的模范了。

王守仁是明代一位明体达用的儒者，他的学说主张“致良知”，和“知行合一”。他的思想渊源是从陆九渊来的。他在当时所表现的事功，在历史上是很显赫的。谁说“书生无用”，儒者只会“坐而论道”呢？现在的日本人，还是很崇拜他的，明治维新据说都是受了他的学说的影响。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，不值得做我们的典型么？这里所择的几篇书牘，多是有关于论学和处事的。他斤斤于劝人“立志”，他说：

今时友朋美质不无，而有志者绝少。谓圣贤不复可冀，所视以为准的者，不过建功名，炫耀一时，以骇愚夫俗子之观德。呜呼！此身可以为尧、舜，参天地，而自期若此，不亦可哀也乎？

——《寄张世文》

这和陆九渊鼓励学者向上的志愿，说“有志，有勇，有立”，是同样的苦口婆心。现在的青年，容易被人收买，供人利用，皆由平时太看轻了自己。对症下药，这类浅近的话也是值得“书绅”的。

张居正是明代一位独裁的宰相。他那勇于负责的精

神，和光明磊落的态度，在他的书牋里面充分表出。他是主张“奉公守法”，不务姑息的。他说：

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，不难破家以利国，陨首以求济，岂区区浮议，可得而摇夺者乎？

——《答应天巡抚宋阳山书》

又说：

自仆受事以来，一切付之于大公，虚心鉴物，正己肃下。法所宜加，贵近不宥；才有可用，孤远不遗，务在强公室，杜私门，首议论，核名实，以尊主庇民，率作兴事。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，明镜见憎于丑妇。然审时度势，政固宜尔。

——《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》

这是何等“斩钉截铁”的话！他又说：

得失毁誉关头，若打不破，天下事无一可为者。

——《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》

又说：

荐贤本以为国，非欲市德于人。

——《答张巡抚濂滨言士称知己》

好一个做领袖的态度！

曾国藩和胡林翼在清代的事功，我想是大家都明白的。他们都是文士出身，能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有了这样的成就，大可替“百无一用”的书生吐口闷气。他们的得力所在，是拿道家的精神、法家的手段来达到儒家的目的，而特别注意于人才的消长和精诚的感召。国藩说：

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，无饷不足痛哭，独举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、赴义恐后、忠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。或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郁不伸，以挫，以去，以死。而贪饕退缩者，果骧首而上腾，而富贵，而名誉，而老健不死。此其可为浩叹者也！

——《复彭丽生》